

论中西思维方式

连淑能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2)02-0040-09

思维方式是沟通文化与语言的桥梁。一方面,思维方式与文化密切相关,是文化心理诸特征的集中体现,又对文化心理诸要素产生制约作用。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语言、科技、美学、文学、艺术、医学、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外交、军事、生产和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与语言密切相关,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是思维方式的构成要素。思维以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于某种语言形式之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语言的使用体现思维的选择和创造;翻译的过程,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而且是思维方式的变换。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主体在反映客体的思维过程中,定型化了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综合和统一。(荣开明等,1989:30)不同类型的思维,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思维形式,如逻辑思维主要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非逻辑思维则主要借助直觉、灵感、想象等形式。思维方法有两类,一是思维过程中运用的具体逻辑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抽象法、类比法、假说法等;二是作为理论工具的方法,如哲学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模型方法等。思维程序是思维方式运行的基本路线,是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在思维活动中的有机结合。

思维方式主要由知识、观念、方法、智力、情感、意志、语言、习惯等八大要素组成。(陈新夏等,1988:504)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动态、有机、复杂的系统。正是这些要素各自的特征及其结构,规定着思维方式的性质、类型和特征,产生思维方式的差异。

根据不同的角度、标准、特点和理解,思维方式可以分为各式各样的类型。如根据思维活动的特征,可以分为感知类(如直观动作思维、情感思维、经验思维等)、想象类(如形象思维、艺术思维、直觉或灵感思维等)、科学类(逻辑或抽象思

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等)、信仰类(理想思维、宗教思维等);根据思维的性质,可以分为主体性(主观性)和客体性(客观性);根据思维的内容,可以分为日常类和职业类(如科学思维、技术思维、艺术思维、军事思维等);根据思维的任务,可以分为认知型(如古希腊发展起来的以求知为旨趣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型(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以践行为目的的思维方式);根据思维的结构,可以分为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横向思维与纵向思维;根据思维的历史,可以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及其相混合的思维;根据思维的地域,可以分为东方、西方、大陆型、海洋型等;根据思维的民族,可以分为汉族、英美民族等。此外,根据不同的特点和理解,思维方式还可以分为封闭性与开放性、收敛性与发散性、再现性与创造性、静态性与动态性、平面性与立体性等等类型。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类型与划分仍待深入研究。

从人类思维的整体看,思维方式具有时代特点、区域特点、社会特点和民族特点,四者纵横交错,构成网络结构。研究这个网络结构,不仅是思维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的任务,也是语言学的任务。

思维方式是历史的产物,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每一时代的思维方式反映该时代的社会和文化,体现该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科学发展程度、认识水平、实践方式和时代精神。从历史的眼光看,可以把人类的思维方式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后馈性、再现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不像西方思维方式那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古代生产力低下,古人智力不发达,思维能力弱,思维空间狭窄,思维方式简单,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模糊的整体,把某种事物或现象看作是世界的始基,都有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朴素思想,往往从主观出发看待客观世界,把主观感受赋予思维对象,加以联想,产生主客互渗、“天人合一”的观念,具有朴素的整体性、直观性、辩证性、模糊性、意向性、单向性以及封闭性、神秘性和猜测性。

近代生产力迅速发展,科技水平大为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也远远超过古代。近代西方实验科学诞生之后,思维方式形成了近代的特点:一是注重分析性和精确

作者简介:连淑能,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收稿日期:2001-10-06

性,抽象思维能力大大提高,但却忽视事物的整体、运动和联系,导致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二是注重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视为思维必须遵循的最高法则,形式思维和公理思维发展较快,直至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诞生之后,才逐渐改变;三是注重认识客体的同时,也注重认识主体,因而自我意识大为增强,促使近代人本主义和个体主义思潮的发展。

19世纪以后,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促使生产力和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促使思维方式发生新的变革,加上东西方思维方式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现代的特点:一是注重综合性、系统性。现代的整体综合是辩证的综合,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系统性的综合,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整体与部分、综合与分析、结构与功能、定性与定量的有机结合和互补兼容,不再是古代的直观经验的综合。20世纪以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用到思维科学,形成了现代的系统综合思维方式;二是注重形式化、符号化。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暂时撇开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着眼于形式来描述事物的结构和规律,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因而思维更具对象性、客观性和精确性。数理逻辑是形式化思维的重大成果,而人工智能则标志着现代思维发展的新阶段;三是注重创造性、多样性。现代思维方式注重立体性、发散性,着眼于新的观念、角度、层次、程序、途径和方法,思维类型越来越多样化,表现出空前的创造性;四是注重动态性、超前性。现代人注重以运动、发展、变化的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把注重时间的纵向思维与注重空间的横向思维结合起来,不仅回顾历史,面对现实,而且面向未来;不仅面向本地、本国,而且面向全球乃至宇宙,显示出高度的开放性、超前性、开拓性、进取性;五是注重东方和西方思维方式互补并重、辩证运用。东方和西方思维方式各有长处和短处,现代思维方式已形成东西互补的发展趋势,即人文与科学、综合与分析、直觉与逻辑、形象与抽象、模糊与精确、定性与定量、纵向(时间)与横向(空间)、归纳与演绎、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等等的综合运用。

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因而也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东方以中国为代表,西方古代以希腊、罗马为代表,近现代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东方和西方属于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因而形成两大类型的思维方式。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以及不同的哲学观、伦理观、价值观、审美观、时空观、心理特征、表达方式等因素,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东方人好静、内向、守旧,西方人好动、外向、开放;东方人求同、求稳,重和谐,西方人求异、求变,重竞争等等。

除了东西方两大区域之外,东西方各国、大陆与沿海(包括半岛、海岛)、农村与城市、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沙漠、高山、草原以及农业地区、工商地区和游牧地区等区域的人,思

维方式也有不同,如居住大陆从事农业的人,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与竞争,眼界狭窄,思维内向、保守、迟缓;安土重迁,乡土观念强;以自我为中心,执着民族意识;好内省自求、重人际和谐,重群体轻个体,竞争意识淡薄;重农轻工商,重实用技术轻科学理论。居住沿海从事工商业、航海业的人,经常与外界交流与竞争,眼界开阔,思维外向、开放、敏捷;以四海为家,常流动奔波,乡土观念淡薄;重个体,重竞争、好争斗;重科学理论和技术,重功利,重开拓、进取、扩张。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属大陆农业型,西方思维方式属海洋工商型。

思维方式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和环境、从事不同行业的个体和群体,在思维素质、能力、方法和职业、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因而思维方式也有不同。例如,思维方式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换。据心理学家研究,3-7岁:具体形象思维;7-12岁:形象-抽象思维;12-18岁:经验型抽象思维;18岁以后:辩证思维发展较快。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具有不同的思维能力,表现为不同的思维方式。男性通常偏于抽象思维,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善于运用概念、判断、推理认识事物,重理性,哲学思维、数字推演能力、空间意识较强,偏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思维外向、求异,性格阳刚、直露、好动、好斗,独立性强,富于竞争精神;女性一般偏于形象思维,较善于整体观察,运用直觉、意象、灵感、想象认识事物,重情感,艺术思维、语言能力、时间观念较强,偏于对内心世界的感觉,思维内向、求同,性格阴柔、含蓄、好静、温和,重人际关系,依赖性强,富于和谐精神。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女性阴柔偏向,西方思维方式具有男性阳刚偏向。(刘长林,1990:573-584)

每个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而也形成了各自的思维方式。民族的思维方式,既有民族性,也有时代性、区域性和社会性;既有各自的习惯性、传统性,又有与其他民族互相吸收、互相渗透的通约性、共同性。本文着重讨论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思维方式的总体特征。

中西思维方式比较是老课题,也是新课题。严复、林语堂等早期名家及当代不少中外专家、学者,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以下挑选十个方面,择其主流,论其大略,着重从总体上简要地讨论中西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力图梳理出一个眉目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中西思维方式在中西文化及汉英语言的种种表现,限于篇幅,留待专文探讨。

1. 伦理型与认知型

中国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哺育了儒家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关注。《易经》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系辞》)出于“忧患”意识,先哲们认为人是认识的对象和核心,探索自然只是为解释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例证,因而从自然现象寻求相应的启示。儒家学说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是做人的“明智之学”。思维的中心在于伦常治道,在于确立和论证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维护人伦关系是为了维护君臣关系和封建专制,最终为了安邦治

国。政治、伦理既与哲学紧密相连,又与哲学家本人的生活紧密相关,哲学家也是政治家、道德家,又是文学家或诗人。古代先哲以政治、伦理为视觉焦点,以维护封建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评判标准,主张“仁、义、礼、智、信”、“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力求“明于治乱之道”、“审于是非之实”,倡导听天由命,顺应自然,体认天道,以天道为人道,以立己为起点,以平天下为归宿,重伦理纲常,重道德修养,重人际关系,重社会秩序,重安定和谐,重现实,重致用,轻自然,轻功利,对探索自然奥秘缺乏兴趣。“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 昭公十八年》)天道是彼岸世界的事,不可及也不可及;人道是此岸人间的事,可知又可及,于是成了关注的中心。孔子哲学以“仁”、“礼”为中心,“仁”寻求人伦关系规范化,“礼”寻求社会有序化,哲学、伦理、政治三者混为一体,主要是人生哲学、伦理哲学、政治哲学,而非西方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形而上学。先哲们主要论人,也谈天说地,其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关心的是人道,而非天道,是人生之理,而非自然之性。在科举制度下,读书人醉心于科举,埋头于八股,“学而优则仕”,对探索自然失去兴趣,科学技术也被统治者视为“奇技淫巧”,受到歧视与打击。这种政治社会环境必然造成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科学的致思倾向,使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政治伦理型的特征。

中国传统哲学从根本上规定人的本质是伦理的,而西方哲学却规定人的本质是认知的。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开放性、海洋型地理环境和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展,引起古希腊哲学家对天文、气象、几何、物理和数学的浓厚兴趣,逐渐形成了西方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传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哲理的探索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形而上学》)培根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人可以用知识战胜自然。哲学家爱智慧,崇理性,尚思辨,以认知自然为视觉焦点,崇尚自然,认识自然,探索自然,最终为征服自然。智者们追究宇宙起源,探索万物本质,分析自然构造,寻求物质元素,诘问人生目的,重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家探索哲理“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为摆脱愚蠢”(《形而上学》),而非为人治。西方哲学是求知识的学问,主体是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注重对宇宙、自然的探索和认识,而非中国的人生哲学、伦理哲学。西方哲学与科学密切相关,身兼自然科学家的哲学家自古以来比比皆是,如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洛克、康德、罗素、马赫、皮亚杰等,这在中国是罕见的。近现代西方人进一步发展了古希腊崇尚自然、追求知识的传统,以探索自然奥秘作为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同感兴趣的研究任务。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人不断排除臆想和猜测,以自然界本身的原因说明自然现象,从物质的内在结构说明其种种属性,从而产生了以实验为基础的逐层深入的逻辑分析方法和种种推断、证明、解释的思维形式,形成了西方科学认知型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的人文精神注重人的伦理道德修养,追求社会秩序安定和谐,倡导仁爱、宽容、义务、奉献,重宗法人际,轻个体人格,注重“群己合一”,突出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群体的分子或角色,

倡导的是集体主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提倡的人文主义,宣扬人性,反对神性;要求人权,反对神权;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群体,认为群体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倡导的是个体主义。

2. 整体性与分析性

中国的小农经济使先民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从男女关系、天地交和和日月交替等现象悟出阴阳交感、“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易经》提出了有机整体的初步图式,把自然现象和人事凶吉都纳入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之中,为中国传统思维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从不同角度发展了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儒家把自然化,道家把人自然化,都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气相通、一理相连的整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学家的“天人一理”、“天人一气”、“万物一体”都是整体思维的进一步发展。经过两汉的宇宙论、魏晋玄学、佛教的本体论,直至宋明理学体系,有机整体性已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

整体性思维把人与自然、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个体与社会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结构中,身心合一,形神合一,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合一。“道”、“气”、“太极”、“理”是整体的基本范畴,阴阳、五行、八卦是整体的基本要素。“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为一体,天中有人,人中有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二程遗书》卷18),这是一种物我不分、物我两忘的诗意境界,是天人同体同德、万物有情的宇宙观。这些观点都把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互渗。“知行合一”强调认知与行为的一致,墨家主张认知与生产实践一致,儒家主张认知与伦理实践一致,法家主张认知与政治实践一致。“情景合一”将主体意向、个人情感与描写客体融合为一。中国的整体性思维不以自然作为认识对象,不把认识自然作为目的,而是以主客一体实现“尽善尽美”的整体和谐境界为目标。

整体性思维把天、地、人和自然、社会、人生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注重整体的关联性,而非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加以逐一分析研究;注重结构、功能,而非实体、元素;注重用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多样性的和谐和对立面的统一。中国的整体思维从“阴阳”之类的对称衍生出中庸、兼顾、联系的二元结构,自战国起,二元结构又发展到“五行”之类的多元结构,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思维。中国人善于发现事物的对应、对称、对立,并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统一中把握对立,求得整体的动态平衡,以和谐、统一为最终目标。古人从直观经验中发现,万物都有对称性,任何现象都是一一对立的,任何事物或行为都包含着两个相对立或对应的方面,必须注意对称,保持适中,兼顾两面,互相联系,只有当这两方面处于均衡对称状态时,才能在视觉上产生美感,在心理上得到满足,取得稳定感。孔子的“叩其两端用其中”以及无过无不及的“中庸”观,注重适中与适度,反对过分或不足,求公允,忌偏激,调和对立,实现中道。对立

和矛盾不过是走向和谐统一的手段和途径。

中国古代先哲也对宇宙进行过思考,但却非常笼统、模糊而简约,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是由混沌的无形之“气”生化而成的,是运动的、和谐的、平衡的,认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张载:《正蒙·太和》),即所谓“元气说”。“元气说”笼统论证宇宙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不可计量,无从说明其内在结构要素和构成途径,只能从宏观整体把握,在“相生相克”的矛盾运动中寻其发展变化。阴阳鱼太极图则体现整体圆融和会、阴阳互补、和谐平衡、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互为因果的中国辩证思维方式。“元气说”以“气”作为万物的本原或本体去解释万物的派生,正是整体思维方式的表现,不像西方人那样去深入探讨万物的本原、分析宇宙的生成、构造,直至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和原子,甚至原子的性质和形状,即所谓“原子论”。以整体性为特征的“元气说”和以个体性为特点的“原子论”分别对中西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横向铺开,注重事物的相互关系和整体把握;后者纵向深入,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中国重辩证思维,轻形式逻辑,注重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强调内在的矛盾、对立和统一。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1978:337)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

在西方,柏拉图之前的早期希腊自然哲学,人与自然不分,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整体观。柏拉图首先提出了“主客二分”的思想。15世纪下半叶以后,自然科学进入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研究并对事物进行分析解剖的阶段,主要采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数学演绎法,从定性走向定量,从宏观走向微观,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考察和分析事物,于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占主导地位。恩格斯(1972:60)说,“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各种各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笛卡儿开创的西方近代哲学明确地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以“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这一原则深刻地影响着近代哲学家,使之成为认识论的一个基本模式,直至海德格的存在哲学开始,以及后来的后现代哲学,才使这一模式得以改变。

分析性思维明确区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灵魂与肉体、现象与本质,并把两者分离、对立起来,分别对这个二元世界作深入的分析研究。西方思维的逻辑性注重从事物的本质来把握现象,这是思维对事物整体加以分析的结果。分析性思维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加以分门别类,把复杂的现象和事物分解为具体的细节或简单的要素,然后深入考察各部分、各细节、各要素在整体中的性质、地位、作用和联系,从而了解其特殊本质,为了解整体及其要素的因果关系提供依据。为此,必须把各部分、各细节、各要素割裂开来、抽取出来、孤立起来,因而分析具有孤立、静止、片面即形而上学的特征。由于这个局限性,思维必须上升至第二层次,即以完整而非孤立、变化而非静止、全面而非片面、相对而非绝对的矛盾、对

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去分析复杂的世界。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倡的。此外,当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系统方法、控制论方法等也从不同方面表现了综合性的思维方式。

3. 意向性与对象性

中国传统思维把主体自身作为宇宙的中心,“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认为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规律,用主体的修养代替对客体的认识,自身内心体验是一切认识的出发点。“道”在人心之中,哲学家的任务在于提出自己所体认的“道”,哲学的视野在于伦常治道。古人不以自然为认识对象,而把自然人化或把人自然化,“天人合一”,主客不分,不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反思,而从主体自身出发,在经验直观的基础上直接返回到主体自身。这种自我体验反思,把知、情、意融合在一起,其中的主观情感使传统思维带有浓厚的主体意向。传统思维注重直觉意象而非逻辑推理,注重求善而非求真。求善的极境,一是内心的完善,即符合道德规范;二是外在的行为,即符合伦理秩序。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判断学术价值重“经世致用”,重君主的权术和驭民术,而非探究自然规律的成就,即重“治人”,而非“治物”。中国的主体意向性思维从主体的需要和实用出发,以人的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为标准,以主体意向统摄客观事实,以政治判断统摄真假是非,以道德判断作为价值判断,寓事实判断于价值判断之中。这是价值判断性思维,而非逻辑推理型思维,是主体意向性思维,而非客体对象性思维。意向性思维使主体介入客体,客体融入主体,“物便是我,我便是物”,“物我一体”,“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自然有我心,我心有自然,使客体主观化,自然人格化,哲学文学化,政治伦理化,达到情景交融,情感与理性合一。主体意向与本体认知合一,突出了主体能动性,使思维受制于情感,以情感代替理性。传统思维重视“治人”与“人治”的政治伦理,使政治意识与伦理价值结合。在科学方法论的影响下,中国重人文轻科学、重主体意向轻客体认知的传统思维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西方思维传统以自然为认知对象,认为只有认识自然,才能把握自然,只有探索自然,才能征服自然,因而主客二分,天人对立,划分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区分自我意识与认识对象,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西方哲学以其创立本体论而持尊重客观的态度。理性主义把主体作为“旁观者”,对客体尤其是本质世界进行探究。这种致思倾向必然摆脱主体意向而导致客体意识,以科学认知为基础,由事实判断统摄价值判断,注重真假选择而非伦理规范。西方注重科学的思维传统明确区分主体与客体,排除主观因素,强调客观性,使客体客观化,“物是物,我是我”,物我二分,以客观和冷静的科学态度对待客观世界,以逻辑和理性探索自然规律,追求的是认识的客观有效性。

4. 直觉性与逻辑性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借助直觉体悟,即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直觉思维通过静观、体认、灵感、顿悟,未经严密的逻辑程序,直接而快速地获得整体感觉和总体把握,重直观内省,轻实测论证,重内心体验,轻实验实证,重直

觉领悟,轻理论分析。这是一种超越感性和理性的内心直觉方法,与内向性密切相关。儒、道、佛三家都注重直觉体悟宇宙本体,力求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孟子的“诚”,老子的“道”,玄学家的“无”,理学家的“太极”,都靠直觉、灵感、顿悟来领会,而不用概念和语言去描述,也不用逻辑推理去论证。孔子说“内省不疚”,孟子主张“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由心的内省以领会宇宙的根本规律;《论语》则靠直观的自然知识证明道德规范。道家认为自然是一个整体,不可分析,只可感觉、体验、领悟;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道”,主张以无知无欲无思之心去直觉体悟宇宙本体。佛教的禅宗主张“顿悟”,“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六祖坛经》),相信瞬间之间,便可“豁然贯通”,“恍然大悟”,强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提倡“心净自悟,顿悟成佛”,力求排除语言文字对思维的束缚,在超时空、非逻辑的精神状态下实现绝对超越,进入佛性本体境界。悟性是直觉思维的核心,通过感觉、体验、意会、领悟、凝思、冥想、内省、自求,以“尽心”、“体道”、“体物”,但难于言表,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求简捷而缺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用形象化语言思辨,缺乏结构严谨、条理分明的实证分析,多以语录、评点、杂感、随笔之类的即兴式心得体会表达观点,缺乏像西方那样的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直觉思维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美学、医学、宗教等的影响尤为深远。

西方思维传统注重科学、理性,重视分析、实证,因而必然借助逻辑,在论证、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形式逻辑,提出了形式逻辑的三大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研究了论证的三大要素(概念、判断、推理),提出了两种思维方法(归纳法、演绎法),尤其创立了演绎推理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以及整个形式逻辑体系,对人类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逻辑性成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形式逻辑还使西方思维方式具有理性、分析性、实证性、精确性和系统性等一系列特征。西方中世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未能从根本上否定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依然主要运用形式逻辑的模式,从教会的《圣经》出发,对上帝的存在采用演绎推理加以证明。15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发展把自然界分门别类,进行分析解剖,进一步推进了形式分析思维模式。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发展了逻辑学,针对亚里士多德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创建了归纳法,强调观察、经验、事实、实验和实证。此后,经穆勒等人的加工与提炼,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结合,形成了现在通常所说的形式逻辑。17世纪60年代,德国莱布尼兹将数学方法引入逻辑学,提出了有关数理逻辑的思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黑格尔提出了辩证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则以唯物主义改造了辩证逻辑。至此,西方已有了演绎逻辑、归纳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等基本逻辑工具。西方逻辑思维的发展导致思维的公理化、形式化和符号化,并衍生出相关的逻辑系统,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爱恩斯坦(1976:574)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

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的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而中国的贤哲却没有走上这两步。”西方人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重视语言分析(包括语法、语义、语用分析),都与思维方式的逻辑性密切相关。相比之下,中国逻辑科学的发展非常缓慢,先秦的《墨经》曾注重逻辑的研究,但汉代以后,墨学衰微了,现代逻辑学的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思维方式的差异。

5. 意象性与实证性

古代中国人注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设象喻理,取象比类。形象思维通过自我体认形成心中的意象(pictures formed in the mind),采用意象-联想-想象来替代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论证,以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集中表现在“立意于象”,“妙象尽意”,“微言尽意”,“入理言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王弼:《周易·明象》)等这类经典名言之中。“得意”需靠直觉顿悟,故不能执着语言,又不能离开语言,顿悟之前需要借助语言和形象符号,顿悟之后,就可以“忘象”、“忘言”了。“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王弼:《周易·明象》)意象性思维以“象”来沟通“意”与“言”,把“象”作为连通思维和语言的纽带。《易经》觉察到文字和语言难以表达意义,提出“立象以尽意”,借助阴阳卦象推断天、地、人之间的变化之理,由象数符号表现其整体意义,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思维不重视语言的逻辑分析,却注重语言所指称的抽象意义或本体意义,不善于运用抽象语言,却擅长于形象语言,用形象的方法来表述抽象的事物。中国语言是意象性语言,文字符号具有象形、会意和形声的特征。中国人注重“意在言外”、“意出言表”,注重语言背后的“象”和“意”,以形象符号隐藏意义,把意象看得比语言还重要。先秦诸子的哲学皆以文学形式(如诗、辞、传说、故事、寓言、神话等)论述博大精深的哲理,就是思维注重形象和意象的例证。哲学中的境界论,美学中的意境论,都借助形象符号,达到超越的本体境界。

基于直观经验的意象性思维还表现为类比性,如比喻、象征、联想、类推等。类比思维把不同的对象加以比较,抓住其中的相似之处,通过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沟通异类,由已知到未知,用具体形象表达抽象意义,借类达情,以义起情,使情物交融,生动形象,易于感悟,达到协同效应。阴阳八卦和五行学说都以天、地、人、物相类比,寻找其间的联系和规律,把人体比作小宇宙,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天有五星,地有五方,人有五脏,伦理有“五常”,还有五色、五声、五味、五官、五谷等等,这是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从个别到个别的类比推理,其结论是或然性的判断,没有经过归纳或演绎的推理和论证。

古希腊也有过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但其所追求的知识不是沿着“观物取象”的方向发展,而是沿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其中几何学被视为知识之冠。思维不像中国那样注重识别、分类、分辨的观察辨物、定性,而是注重形体,特别是解剖,侧重于事物的要素、结构,重定形,而非定性。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注重加工程序、技巧、分析、比较的工匠传统大大发展。到了近代,西方实验科学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便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技

术问题与科学理论有机结合,使思维方式注重实证分析和逻辑论证。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创立了归纳法,强调观察、经验、事实、实验、例证、分析、实证,主张用归纳的、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把个别的现象上升到一般的理论。此后,西方注重实证的特点经久不衰,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了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唯一的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或存在于事实中的恒常关系,这只有靠观察和实验才能做到;这样取得的知识是实证的知识,只有被实证科学所证实的知识才能成功地运用到人类实践的各个领域。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和法国哲学家阿芬那留斯创立了第二代实证主义,德国哲学家石里克等创立了第三代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直接把实证和逻辑连成有机的一体,使知性思维的逻辑和实证互为表里。实证性成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

西方的实证性思维重视语言的作用,把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认为要把概念与观念具体化,必须借助语言。语言是概念的形式、观念的结构、沟通的媒体。西方的拼音语言不是对自然现象的摹拟,而是人为规定的信号,信号以理性的规则建立象征符号,以声音组合决定意义,取决于人的主观分析、概括和抽象的能力,因而导致语言的信号化和逻辑化,比较容易上升到逻辑思维。逻辑论证必须借助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和各种思维方法,在理性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和联系,对思维对象进行间接的、概括的加工,因而呈现抽象性特征。

6. 模糊性与精确性

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共同特征。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模糊性经过长期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没有像西方思维方式那样在近代受到精确性的否定,因而直至现代,中国思维虽然吸收了西方思维的精确性,但仍有古代模糊思维的特征。古代中国人把宇宙看作是混沌的整体,思维对象是模糊的,思维主体也是模糊的,以模糊的思维去认识模糊的整体,用模糊的方法和工具(如模糊的概念、范畴、语言和粗制的器具)整体综合地把握其总体特征,缺乏对事物本质的准确认识,注重对事物作质的判断,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疏于分析实证,重视直觉体悟,缺乏逻辑推理,描述事物重求其似、其“神”,不甚求其真、其实,不甚求其精确、清晰,往往带有朦胧、粗略、笼统甚至是猜测的成分。中国的概念和范畴缺乏周密的界定,几乎都是多相的,即一个概念由多个判断来规定,如“易”就有三个判断来定义,“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正义》)此外,如“道”、“气”、“神”、“理”、“诚”等关键概念都缺乏精确界定,显得深奥而模糊不清,其内涵与外延的伸缩性和多义性很大,难以精确把握。中国的推理一般是模式型的,即从某个基本模式出发,按照一定原则,把有关对象都纳入这一模式,如“阴阳五行说”以阴阳五行作为世界模式,推断天地人的变化之理,缺乏严格的规范,较多借助类比,因而显得模糊而不严密。模糊性思维使用“亦此亦彼”的模糊概念和命题进行思维。此外,用整体、联系、发展的而非片面、孤立、静止的观点考察事物,事物的界限也不易分清。

数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者崇拜治人之权术,鄙视甚至禁锢科学技术,尤其轻视以精确性为特征的数学。古代中国

有算术和算盘,但少有专门从事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缺乏严格的数学推导和演绎系统;注重实用技术,缺乏严密的逻辑规则的制约,缺乏精确的实验和定量分析。相比之下,西方人自古以来就重视数学和逻辑,因而具有精确性的素质。

精确性是西方近代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西方近代实验科学注重对事物分门别类、分析解剖,重视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因而促使数学、力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确立与发展,也促使西方思维方式具有精确性的特征。思维对象虽然是模糊的,但西方人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工具(如概念、范畴、定义、逻辑、规则、原理、定律、公式、语言等“软件”和显微镜、望远镜、助听器、计算机等“硬件”)却相当精确,这就导致了精确思维的习惯。西方的概念和范畴是单相的,有周密的界定,即一个概念只用一个判断来规定,其内涵与外延都非常明确,通常需用严格的定义引入。推理一般是命题型的,即从某个初始命题出发,按照一定规则,依次推出一系列的命题系统,如古希腊德谟克利特从“原子是不可分割的最小微粒”,推出古代原子论。这种推理要求初始命题十分明确,推理程序非常严密,因而显得精确。古希腊人注重雕刻这种三维艺术,重视几何图案、结构解剖、形体比例,注重模仿、写实、逼真,忠实于客体对象的原貌和再现,加上科学知识和技术,必然导致精确的致思传统。精确性思维建立在二值逻辑基础之上,使用“非此即彼”的精确概念和命题进行思维,要求对任何概念和命题都作“非此即彼”、“非真即假”的判断,不允许第三值或更多值,其基本原则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精确性思维还因重视数学而得到加强。亚氏逻辑最早运用于几何学,数学不仅是知识,也是思维的工具,这就导致逻辑和数学汇合成数理逻辑,使思维更趋精确。西方人崇尚科学和理性,注重思维活动的严格性、明晰性和确定性,注重思维程式的数学化、形式化、公理化、符号化和语言的逻辑性,思维方式也必然带有精确性。

然而,现代西方人又发现复杂的世界存在着许多模糊的现象和事实,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情况下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反映在思维中就产生了模糊性,由此便出现了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模糊语言等学科。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精确把握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的模糊性。精确与模糊并重,精确中有模糊,模糊中有精确,这是现代(尤其是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

7. 求同性与求异性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政治结构,要求社会和个人的信仰和观念一元化、一体化、同步化,造就了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思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压制异己的先例;汉代孔子“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大一统提供了思想基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径,古今之通义也”。董仲舒认为一统是天经地义的事。儒家倡导三纲五常,宣扬礼乐教化,维护封建“大一统”。“礼”要求社会秩序化,“仁”要求人伦关系规范化,“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寻求人与自然同一、人与社会同一。科举考试制度要求按统一的八股文格式写同类文章,表达同种观念和同类观点。经过儒道互补的两汉经学和儒、道、释三位一体的宋明理学,经过长期的积淀与强

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以维护君权专制为核心,以皇帝圣旨为最高权威,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特权制度,强化一元化的政治结构,把不同思想视为异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如同一人长跑,西方文化的发展如同多人接力。

西方智者对于自然奥秘充满了好奇心,形成了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精神。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是三代师生关系,但在探索、求知的某些问题上既有继承性又有求异性,这正如亚氏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自古至今,西方思维方式善于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思潮尤其是科学发展的不同历程而变化。综观西方哲学史,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可谓流派繁多、思潮澎湃,人才济济,你追我赶,前仆后继,如同多人接力。例如近代以笛卡儿、培根的哲学思维和牛顿的经典力学为规范的理性“分析程序”模式就不同于古代直观的整体思维模式;现代以量子力学、相对论为规范的理性“综合程序”模式又否定了理性“分析程序”;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倡导归纳法,贬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而以笛卡儿、莱布尼兹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又主张演绎法,贬低归纳法。笛卡儿的“怀疑论”主张思想自由,“破除学界之奴性”,摆脱前人之束缚。西方思维的批判性首先是由理性主义决定的。理性主义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主体如旁观者认识客体,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已有的知识,总认为无垠的世界高深莫测,是个“永恒的谜”,只是“部分地可以认识”(爱恩斯坦),求知永无止境,批判不是为了废除知识,而是为了增长知识。这种求异忌同、标新立异的开拓精神使西方科学文化在继承、怀疑、批判、挑战和否定的呼声中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产生了名目繁多的理论体系、彼此各异的思潮和枝叶横生的流派、学派。产生于科学与民主氛围之中的求异性思维使西方人形成个体主义,勇于探索,敢于挑战甚至否定前人、别人、智者、权威的名言、结论,不易随意苟同他人而喜欢各抒己见,思维方式趋于多元化,注重多思路、多方向、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法,寻求新的方面、新的途径和解决问题的新办法,重视追根溯源,不断处在“为什么”-“是什么”-“为什么”这种无限的反复推进的过程,具有发散性、开放性,而非收敛性、封闭性,因而有利于发挥创造精神。

8. 后馈性与超前性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政治结构和“大一统”思想促使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唯圣、唯书、唯上的后馈性特征。两汉以后,独尊儒术,儒家“六经”成为神圣的经典。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朱熹就此作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四书章句集注》),这就奠定了传统思维的后馈性传统。中国贤人膜拜祖先,崇尚圣人、经典、权威,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以经典之学说为信条,以权威之结论为根据。贤人们饱读经书,满腹经纶,开口子曰,闭口诗云,喜欢引经据典,“温故而知新”(孔子),“言必称三代”(孟子),嗜好对经书进行训诂、注疏和考据(即所谓“经学”),以先王之法、圣人之言作为推论的前提、证明的论据或思维的结论,但又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这已成为许多人著书立说的习惯思路。经过长期积淀,这一传统使中国人重视回顾自己的历

史,崇拜祖先,尊重经验,推崇传统,以托古求认同,以“古已有之”为立论准则,以“故纸堆”而非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习惯在古人、圣人、前人、权威的思维模式和历史结论中再思维,强调历史的继承性,不敢怀疑和批判,缺乏否定和超越的精神,以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中国人崇古敬老的传统表现在学术上重经史、社会上崇祖先、心理上怀古旧和思想上好常恶变、求稳怕乱的倾向。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对未来不大感兴趣,但对过去却甚为自豪,把“祖述尧舜”、祖宗遗训、圣贤教诲作为超越时空的真理。封建统治者排斥非圣人文化,禁锢非传统的新文化和外来文化。这种厚古薄今、排外用中的致思倾向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因而思维方式倾向于因循守旧、求同排异。中国非宗教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注重现世,不像西方基督教文化那样注重来世。中国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期封建专制、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视野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从过去了解现在并推知未来,因而偏向于注重时间而非空间。注重时间的纵向思维,视野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中国人却注重过去,这就导致中国人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而较弱的空间意识。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不像西方思维方式那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这与中国文化数千年绵延不断的超稳定性密切相关。始于秦朝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在朝代不断更迭、“城头变换大王旗”之下发展的,因而中国思维方式的传统色彩特别浓厚,远甚于西方。在“大一统”的思想框架里,传统思维方式世代相袭,难有较大的发展和变化。从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上属于近代分析性思维以前的直观综合、整体把握的阶段,尚有待于从“传统”转变为“现代”,从“向后看”转变为“向前看”,从“后馈性”转变为“超前性”。始于古希腊城邦制的公民文化以及崇尚民主、自由、科学和理性的传统是西方文化的主流。西方智者对自然奥秘富于好奇和想象,不断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未来的发展善于提出预测和预言,进而运用预见、理性和科学信念,面向现实和未来,不断提出假设、理论和方法,不断探索、开拓和创新。自古以来,预测性、超前性思维使西方人产生无数的理论和学说,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哥白尼的日心说,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以及关于人口、生态、空间、海洋等的种种预测和展望。1943年,德国弗勒希特海姆首创未来学,主张像研究历史一样研究未来。未来学注重各种预测,包括社会预测、经济预测、科技预测和市场预测等。超前意识和个体主义使西方人不迷恋历史,不崇拜权威,不固守前人已有的思维模式,而强调怀疑、批判和否定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西方人勇敢地反叛了黑暗的中世纪,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神学、经院哲学和先哲们的许多观念。西方科学的不断开拓和创新推动西方文明史的发展。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和长期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使西方人的思维视野不受地域限制,因而偏向于重视空间,注重全球乃至太空,同时也注重现在和未来。注重空间的横向性思维,视野宽广,遍布微观、宏观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因而有利于探索、开拓、进取和创新,也有利于培养超前性意识。(下转封三)

(上接第 46 页)

西方思维方式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各个阶段的差异比较大,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进步的幅度也比较大,因而不称为“传统思维方式”。西方思维方式既继承传统的重自然、重理性、重科学的基本精神,又不固守传统的、过时的思维模式。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使西方人扬弃了古希腊人那种朴素的直观整体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的发展又使西方人扬弃了近代那种孤立、静止、片面、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发展为多维、开放、系统、综合、形式化、公理化的具有现代特点的思维方式。西方人注重认识论、方法论的转换和变换,注重引入新方法以征服自然、认识自身,不求一成不变的稳定性。中国人则对新方法反应冷淡,习惯于因循守旧、按部就班。西方思维方式的许多特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形成和完善的,具有自觉性、反思性、突破性和革新性;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许多特征是沿着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发展而形成和完善的,具有自发性、连续性、再现性和稳定性。从总体看,西方思维方式具有“向前看”的超前性、创造性的特征。

9. 内向性与外向性

中国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人们缺乏与外界的联系,视野狭窄,思维闭塞,重乡土观念,重“叶落归根”,视中原为本土,视中国为“天下之中”,加上一体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大一统”的思想,使思维对象指向自身而非自然,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重视社会治理,探究“治世之道”,不注重探求、改造和征服外部世界,重视历史传统,唯圣、唯书、唯上,不易接受新事物。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内向自求,认为价值之源在于一己之心,因而重“心术”,重身心修养,重伦理道德,重三纲五常,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通过“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反省内求”以汇通万物,达到去恶求善。“人人可以反求自识,而无事乎向外追索”(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熊十力)。自识本心即可达到自我完善,亦即把握了外界事物的本体。儒家在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反省人的社会本质,道家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反省人的自然本性。这种返回到人自身的致思倾向是内向性的思维方式。

内向性思维导致中国人求稳的心理和好静的性格。自然静,人也静,以静对静,只有静才能体悟自然、自识本心,才能悟出人生真谛,寻求人际和谐。老子的《道德经》称道虚静,倡导平心静气、安静自守、洁身自好、好自为之、节制欲望,不可争名夺利。“静”、“思”、“悟”、“忍”,成了大多数中国人思维和性格的特征。内向自求还造成安分守己、知足忍让、重义轻利、满足现状、害怕竞争、怯于突破、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的性格,这就压抑了人的探索精神和创造精神。

西方大多数国家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始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思维的对象倾向于外界,重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寻求外部世界对人最有价值的东西,为己所用,富于好奇和想象,较易接受新事物,整个思维方式是开放型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主张个性解放,

反对宗教桎梏。这种追求自由、个性的精神对西方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人的地理大发现又促使海上大扩张,对外侵略、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成了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一大特征。

外向性思维导致西方人求变的心理和好动的性格。自然动,人也动,以动对动,只有动才能改造自然、征服世界。“动”、“变”、“争”、“斗”成了西方人思维和性格的特征。哥伦布外向探险充满了殖民味和征服欲,体现了个人奋斗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不像郑和内向自求的七下西洋,只是为了显耀大明的威风而秉承皇帝的意旨。自孔子时代至 19 世纪末,中国思想家竟没有一人到过公海冒险探索。外向性思维使西方人富于全球观念和宇宙意识,以四海为家,崇尚竞争,嗜好冒险进取、弃旧迎新、易地搬迁、离婚择偶,爱好攻击性、刺激性的激烈运动。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这也可以看出中国的“仁者”与西方的“知者”之间的不同。

10. 归纳型与演绎型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直观经验,习惯于直觉体悟,从主体意向出发对实践经验和内心体悟加以总结、归纳,成为“圣言式”或“格言体”的模糊概念与范畴,如“道”、“气”、“理”、“心”等学说。这些多为意会、领悟的结果,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与严密的演绎推理,因而难以形成像西方那样完整而系统的科学体系。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思维也有演绎法,那基本上是“唯圣”、“唯书”、“唯上”的演绎法,即把圣言、经典、圣旨或主观成见作为绝对正确的演绎前提,但也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不像西方那样注重形式逻辑。中医的阴阳说、经络说,注重整体观念、察言观色、临床经验、师徒传授、辨证施治,具有很高的临床正确性,但基本上是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体系,不像西医那样注重生理学、解剖学,注重化验、透视等科学的验证。“神农尝百草”等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智者重亲身体验,轻理论论证,重经验总结,轻演绎推理的致思倾向。中国智者长于算术,但疏于数学;长于“语录式”和“格言体”的“微言大义”,但短于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擅长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缺乏能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注重“经世致用”,忽视基础的或宏观的研究。北魏贾思勰的农业名著《齐民要术》、北宋沈括的科技名著《梦溪笔谈》、明朝李时珍的药学名著《本草纲目》、明朝宋应星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名著《天工开物》等是中国科技名著,但都是搜集、整理、编纂、总结、归纳实用性科技的经验、体会和方法,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形式逻辑,对西方思维方式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亚氏强调演绎法,把演绎看作是一种高级的、能推导出未知的思维方法。此后,演绎法不仅成为西方学者构建理论体系的一种手段,而且成了西方人比较习惯的一种思维方法。到了 17 世纪,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反对亚里士多德以来直至经院哲学的演绎法,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强调观察、经验、实验、事实,再归纳出知识;而以笛卡儿、莱布尼兹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又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由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从总体看,西方思维方式既有演绎

法,也有归纳法,在各个时期以及思维的过程中均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近代西方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论战表明,归纳法与演绎法各有长处和短处,必须互相补充,交替并用,辩证统一,才能获得科学的知识。一方面,归纳为演绎提供前提。演绎借助一般去认识个别,但这个一般却源于个别,是个别归纳的结果。另一方面,演绎为归纳提供观念的指导。归纳从个别推出一一般,但归纳的过程必须在一般性的观念指导下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才能有针对性 and 有效性,而这个观念的指导正是由演绎提供的。没有经过演绎论证,归纳的结论也难以上升为规律性的科学理论。由于归纳与演绎互为前提,互相渗透,因而归纳与演绎必须互相补充,互相转化。人们以一般观念原理为指导,通过归纳,从个别到一般,当这个一般成为演绎的前提时,就必须再转化为演绎,才能使归纳的知识得到扩大与加深。归纳法从无限或有限的面走向有限的点,点与点之间是并列关系,彼此相对独立,难以凑成一个体系;演绎法从有限的点走向无限的面,是点的无限繁殖,点与点之间是血缘关系,枝叶关系。观点家族不管枝叶如何茂盛,均系于一棵大树(大前提)之下,同属一个结构之内。归纳与演绎如此相互作用,往复循环,步步加深,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西方思维方式自古以来就注重形式逻辑,擅长于演绎法;近代实验科学诞生之后,又注重归纳法。演绎与归纳相结合,使西方产生无数的理论体系,大大地促进西方科学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经验的、直觉的归纳,也有“唯圣式”的演绎推理,但形式逻辑不发达,较少产生科学的理论体系,而擅长于“点评式”的议论和“语录式”的言论。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善于将一本书归纳成一句话,而西方人却善于将一句话演绎成一本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思维方式的上述 10 对基本特征,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早在 2000 多年前,中西思维就出现两种不同的偏向:中国贤者的思维沿着政治伦理的方向发展,而西方智者的思维却沿着科学认知的方向前进。中国思维具有阴柔偏向,含有艺术家的素质,力图求善;西方思维具有阳刚偏向,含有科学家的素质,力图求真。中国政治伦理型的思维方式重伦理道德,重身心修养,重内向自求,重安邦治国,因而带有强烈的主体意向性。政治上追求安邦治国,产生了“大一统”思想,唯圣、唯书、唯上使思维带有后馈性和求同性。注重政治伦理,必然对探索自然失去兴趣,因而热衷于对天地人作比附,进行直觉体悟与整体综合,用以解释政治、社会、伦理、人生的种种问题。内向自求,主体意向与直觉体悟相关,直觉体悟又必须以整体综合为前提,而整体综合是直观经验的结果。重直观经验又引出重意象、重归纳。以直觉体悟、整体综合把握事物,易使思维带有模糊性。西方科学认知型的思维方式重探索自然、重求知、重理性,重外向探求,因而带有强烈的客体对象性。科学上追求知识和理性,必然

要借助逻辑,以分析和实证的手段获得对认知对象的精确认识。追求科学认知又促使人们不断求异、创造、超前,采用演绎与归纳的方法,不断推导出新的科学体系。

上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特征是从总体的、相对的角度而言的。采用不同的角度,考察不同的时期和民族,根据不同学科的标准,按照不同群体的观点,为了不同的研究目的,可能对中西思维方式的特征得出不尽相同的看法,本文仅作为抛砖引玉之用。

参考文献:

- [1] Altarriba, J. ed. *Cognition and Culture: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to Psychology*.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1993.
- [2] Cole, M. & Scribner, S. *Culture and Thought: A Psycholog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4.
- [3] Inkeles, A. & Sasaki, M. eds. *Comparing Nations and Cultures: Readings in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6.
- [4] Lerner, R., Meacham, S. and Burns, E.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13th ed.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 1998.
- [5] Rakoczy, S. ed. *Common Journey, Different Paths: Spiritual Direction in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2.
- [6] Russell, B.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1996.
- [7] Samovar, L. & Porter, 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8th ed. New York: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8] Shlechter, T. & Togliola, M. eds. *New Directions in Cognitive Science*.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rp, 1985.
- [9] 爱恩斯坦. 爱恩斯坦文集(第 1 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 [10] 曹文轩. 思维论.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 [11] 陈新夏, 郑维川, 张保生. 思维学引论[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12] 丁润生等. 现代思维科学[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2.
- [13] 恩格斯.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 [14]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3 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78.
- [15] 刘长林. 中国系统思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8.
- [16] 卢明森. 思维奥秘探索——思维学导引[M]. 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1994.
- [17] 阙道隆主编. 中国文化精要[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 [18] 荣开明等. 现代思维方式探略[M]. 武昌: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9.
- [19] 王淼洋, 范明生主编. 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4.
- [20] 吾淳. 中国思维形态[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21] 张岱年, 成中英等. 中国思维偏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22] 张恩宏. 思维与思维方式[M]. 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 [23] 张义生. 现代思维概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入编刊物

外语与外语教学

(月刊)

2002 年第 2 期

(总第 155 期)

2002 年 2 月 1 日出版

主办单位 大连外国语学院

编辑单位 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大连市延安路 94 号, 116002

电话: 0411 - 2803121 - 6388

E-mail: flatt @dlul. edu. cn

主 编 徐 璿

印刷单位 辽宁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总发行 大连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4 - 6038

CN21 - 1060/ H

邮发代号 8 - 22

国外发行代号 6248M

国内定价 5.30 元

